

检查交代我向党进攻的思想情况

(杨春甫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检查交代材料)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检查交代我向党进攻的思想情况

我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犯了攻击党中央、国务院的严重罪过，主要表现是七月十九日在东北组的发言。形成这个发言，是受毛远新的思想影响和策动，及在会上与上海黄涛串联有关。对在会议期间，我与毛远新的联系，我与黄涛的串联，已向党交了初步的检查交代材料，现在就我错误思想的形成作初步检查交代，并向党老实的认罪。

一、参加这次会议，我的思想，总的是受毛远新黑讲话、黑旨意的毒害和策动。有个这次会是要解决经济战线路线是非的问题，因此，在讲话以前有三个错误的看法支配着我的思想。

- 1、认为国务院务虚会是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务虚会是为全国计划会作准备，计划会是右倾翻案风的高峰。
- 2、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了，教育、科技方面取得胜利，经济战线力量大，触动得不够，这次开这个会可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3、认为会议规定的时间短，是主持会议的谷牧副总理捂盖子，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总想延长会议时间。

我去年亲自参加了全国计划会议，会上发给了我有关务虚会的极为机密的简报资料，按理说我对务虚会是知道的，认为务虚会极重要。但由于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特别是天安门事件以后，就逐步地接受了毛远新传回来的一套黑讲话，在开会前按照他的黑旨意和策动的要求作准备工作，反复学习领会，就受毒更深。在临走以前，我的思想就开始对务虚会有了怀疑的想法，错误地认

为务虚会时间正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搞的。到北京后和黄涛串联，这个错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抓务虚会是解决经济战线路线是非的大问题。在东北组会上听到务虚会原来是八个组，后来又增加了理论组和科技组，就错误地怀疑理论组与胡乔木组织的“论总纲”有关系，科技组和胡耀邦的“汇报提纲”有关系，加上又有个“工业十八条”，就认为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是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的风源，计划会是右倾翻案风的高峰。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长期以来我都认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盲目地相信毛远新回来假造的和真假难辨的东西，对“四人帮”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另搞一套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对他们的干扰破坏也没意识到。对批邓的提法有时是有些感觉的，觉得和中央五号文件华主席讲话精神有不一致的地方，批邓的调一再升级，但因为有了个天安门事件和追查谣言，就不敢怀疑，还错误地认为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思想上要紧跟。这样对毛远新六月传来的邓纳吉在党内有影响，在高级干部中有很大市场，还有可能上台，斗争肯定还有反复等等黑话也就都信了。毛远新传回来的国务院要开个经济会议，解决经济战线的路线是非，要攻一下的策动，我就错误地理解为教育、科技战线可能是差不多了，经济战线还不行，转到经济战线方面来了，经济战线不同于教育和科技战线，战线大，受唯生产力论和单纯业务观点影响大，会有阻力，这次开会，专门批邓、批条条专政，可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了这样的错误思想，就对主持会议的谷牧副总理有反感和对抗情绪，对国家计委有对抗情绪，总想把会期延长，说话带刺，讽

刺挖苦。当时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发言，我不讲也可以，但因为谷牧副总理一再强调会议不能太延长，我自己也认为会不能总开，再不发言机会不多了，因为毛远新要求在会上攻一下，不攻不好向他交代，要攻就得攻的厉害，不然显不出来，所以就在十七日会议决定还要再闹两天的情况下，自己准备了个讲话提纲，十九日就放出来了。讲了三个钟头，毒汁四溅，对党中央、国务院发难，猖狂进攻，真是挖空了心思，无所不用其极，把我参加计划会知道的事都作为进攻的炮弹，甚至连我自己平时长时间不能理解的为什么要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这样的问题也提了出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事实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当了打手，起了亲痛仇快的极恶劣的影响，真是罪该万死！

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省委，事后也没报告省委，这也是原则性的错误，我的错误和罪过完全是自己犯的，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我犯了这样大的罪，我要向英明领袖华主席请罪，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请罪，向国务院请罪，向各部委请罪，向省委请罪，向人民请罪！

二、我和“四人帮”的关系。

在会议期间，给毛远新送了九份简报，从第三号简报以后，凡送给毛远新的，包括王洪文召见后的简报在内，报头都改成了毛远新的名字。前三期一起送的，附了一封短信，以后的也是积两三期送一次，最后一期会议结束，第二天要回沈阳，才先给他发了一份简报。他只给沈秘书写过一个纸条，说会议结束时可能看看大家。

和黄涛串联，包括在院内院外散步，不算王洪文召见约有八次之多，三次没谈会上的问题，五次都谈了会上的问题，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我在思想上，特别是对国务院务虚会、计划会的错误认

识上受了毒，在发简报的问题上也受了他的影响。

和王洪文就是二十日在黄涛房间召见我和我省另外两个同志。

以上已写有专门检查交代材料，供组织上清查。

三、我犯了这样大的罪，自己认识总是不够。转变立场，检查交代，改正错误，非常不主动，辜负了华主席、党中央的容忍和等待，辜负了省委的容忍和等待，辜负了人民的容忍和等待，这样就一天天扩大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我对“四人帮”在会议期间的阴谋活动没识别出来，自己当时的认识，只停留在错误地认为会上是有斗争的，斗争的焦点是在经济战线的路线是非的斗争，不知道是“四人帮”插进手到会议上进行篡党夺权的斗争。对黄涛的串联，和我对本组一些同志的影响，认为是认识接近的一些来往，未能从阶级关系上来认识这种来往是政治上的结合，是串联活动。对王洪文的召见，也没有认为是“四人帮”在搞阴谋，对这些都是一般的看待，就未能及时识别出他们的阴谋和自己的错误。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我自己是坚决拥护的。揪出“四人帮”，为党除了大奸，为国除了大害，为民平了大愤，我自己和人们一样是万分高兴的。也为我搬掉了头上太上皇毛远新这块大石头而感到心情舒畅，我多次地表示，打倒“四人帮”死了也甘心。在听了打招呼会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讲话后，知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滔天罪行，也知道了我在计划工作座谈（会）议上的发言是为“四人帮”效了劳，但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过认识还非常之低，把自己的发言看成孤立的，仅认为是被“四人帮”所利用了，甚至对我的发言是受毛远新策动的，那时也一下子没认识到。对与黄涛的串联，看成是一些来

往，一时认识提不高，后来听说黄涛是“四人帮”的重要成员，又怕起来，不敢揭发交代，总是回避，对党对人民蒙混欺骗，增加了自己新的罪过。

我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严重的罪过，这是事实，在事实面前要老实，我愿意彻底检查交代问题，并请求党对我进行审查。我完全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对我停职交代问题的决定。

杨春甫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